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主办
李卓 主编

南开日本研究

NANKAI JAPAN STUDIES

2013

王新生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大平正芳——以第一次日元贷款为中心

安成日、李金波

试论二战后日本在领土处理问题上的态度与美国托管冲绳

修 斌

透视日本海洋战略：历史考察与现实应对

张建立

日本茶道的源流与精髓

王 勇

唐代传入日本的儒学书籍——以8世纪为中心

[日本] 額 纈厚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

程永明

日本企业软实力的提升路径——以公共文化事业参与为例

W A 世界出版

封面题字：范曾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主办

李卓 主编

南开日本研究 2013

王新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大平正芳

——以第一次日元贷款为中心

安成日、李金波：试论二战后日本在领土处理问题上的
态度与美国托管冲绳

修 斌：透视日本海洋战略：历史考察与现实应对

张建立：日本茶道的源流与精髓

王 勇：唐代传入日本的儒学书籍

——以8世纪为中心

[日] 纈纈厚：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

程永明：日本企业软实力的提升路径

——以公共文化事业参与为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开日本研究 2013 / 李卓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12-4528-4

I. ①南… II. ①李… III. ①日本—研究 IV. ①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99930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封面设计 嘉 维

书 名 南开日本研究 2013

Nankai Riben Yanjiu 2013

主 编 李 卓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24印张

字 数 412千字

版次印次 2013年9月第一版 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528-4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刊的出版承蒙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

编辑委员会

主编

李 卓

编辑委员（按拼音排序）

陈健安（复旦大学）

高 洪（中国社会科学院）

关 权（中国人民大学）

刘江永（清华大学）

李 晓（吉林大学）

李玉潭（吉林大学）

莽景石（南开大学）

孙 歌（中国社会科学院）

宋志勇（南开大学）

王新生（北京大学）

杨栋梁（南开大学）

周颂伦（东北师范大学）

目 录

中日关系研究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太平正芳

——以第一次日元贷款为中心 /1

王新生

中日关系中的政治文件与两国关系的发展 /20

张耀武

试析中日复交以来日本各界对华认识的主要特征 /33

田庆立

关于中琉关系历史遗迹调查与研究 /51

赖正维

日本政治、外交研究

试论二战后日本在领土处理问题上的态度与美国托管冲绳 /72 安成日、李金波

徐万胜

透视日本海洋战略：历史考察与现实应对 /108

修 斌

灾害与政治

——东日本大地震的“政治病灶” /128

乔林生

福岛核危机对日本“核电”产业的影响 /141

尹晓亮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

日本战后改革时期的财产税政策 /151

刘 轩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转移 /168

张玉来

日本公共住宅政策刍论 /178

周建高

战后日本的金融深化：基于 1955—2006 年两阶段的实证分析 /190

郑 蔚

日本文化、教育研究

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以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例 /202

王铁桥

日本茶道的源流与精髓 /217

张建立

日本新自由主义教育的困境 /240

谭建川

日本历史研究

唐代传入日本的儒学书籍

——以8世纪为中心 /250

王 勇

镰仓时代的灾异及其应对 /261

王玉玲

从南京沦陷前后日媒报道看日本的战时传播 /272

孙继强

岛崎藤村女性题材小说中社会转型期的日本近代女性 /285

李 敏

海外专稿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 /295

纴纴厚

专题研究

日本企业软实力的提升路径

——以公共文化事业参与为例 /310

程永明

日本国家品牌战略的演化：从“日本的品牌”到“日本品牌化” /325

平力群

日韩两国发展老龄产业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339

田香兰

日本研究学术史

六十年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 /353

王金林

《南开日本研究》征稿启事 /372

中日关系研究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大平正芳

——以第一次日元贷款为中心

王新生

内容提要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不仅将政府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而且也改变过去的外资政策，引进外国资本甚至外国政府贷款。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经济界人士、政治家起到积极的作用。尽管在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问题上，通产省、外务省、大藏省等日本行政部门及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存在不同意见，但在大平正芳首相的主导下，最后决定对中国承诺向六个建设项目提供日贷款。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既有确保能源供应、推动中日经贸发展、开拓中国市场的经济因素，也有推动中日双边关系全局发展、扩大国际影响、减少历史问题对两国关系形成负面影响的政治因素，大平首相的对华观也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引进外资 大平正芳 政府开发援助 日元贷款

作者简介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 30 多年,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其中绝大部分为日元贷款),对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本文简要论述大平正芳内阁时期围绕第一次日元贷款中日两国各自的政治过程以及大平正芳本人的中国观。

一、中国政府转变外资政策

“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决定大力推动经济发展,1977 年 8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以华国锋为首的政府决策层要求在 1980 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能够“大见成效”,因而在 1978 年 2 月再次提出《1976—1985 年国民经济 10 年发展纲要》。具体内容为:10 年内工业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 10% 以上,主要工业产品例如钢铁从 1977 年的 2374 万吨增加到 6000 万吨;全国分为六大经济地带,以内陆作为战略后方,建设 14 个新工业基地;建设 120 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 10 个大型钢铁基地、10 个大型油气田等;农业机械化达到 85% 以上,农业增长率年均达到 4%—5%,粮食产量从 1977 年的 2.8 亿吨增加到 4 亿吨等。^①按照这个规划,20 世纪末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需要包括成套设备在内的技术引进。1977 年,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划委员提出的 1978 年到 1985 年技术引进计划,即在 8 年时间内引进总额 65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但仅在 1978 年就签订了 63.6 亿美元的技术引进合同,其中成套设备占 95%。^②1978 年 5 月 17 日,国务院成立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计划,并组织各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赴发达国家和地区考察访问。5 月,国家计委等部门组成经济考察团

① 河地重藏等:《现代中国经济与亚洲——市场化与国际化》,世界思想社,1996 年,第 40 页。

② 梶村秀树、金泰相编:《中日经济交流的现状与展望》,白桃书房,1989 年,第 10 页。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大平正芳

赴香港、澳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回到北京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建议积极利用港澳的资金、技术、设备，迅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央领导人明确批示“总的同意”，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①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对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比利时、丹麦等五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中共中央对这一考察极为重视，出发之前邓小平专门约谷牧等人谈话，要求代表团“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谷牧考察团回国后建议中央充分利用发达国家普遍生产过剩、资金过剩但大多对华友好、重视发展对华经贸往来、愿意对华投资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随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时明确提出：“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②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③但当时中国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面临着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1978年初中国的外汇储备约有20亿美元，但由于以现金支付外国成套设备的进口，当年年底外汇储备只剩下12亿美元。^④随着70年代末期进口需求的增加，资金需求、尤其是外汇需求急速膨胀。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决定接受比民间投资条件更加优惠的海外政府资金。

实际上，最初公开要求改变外资政策和经济建设模式的文章发表在1977

① 曹普：“建立特区对外开放”，《学习时报》，2001年6月25日。

② 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④ 《日本经济新闻》，1979年12月5日。

年7月的《北京周报》上，其题目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利用外国物资》，主张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资金发展中国经济。^①这明显是与原有的政策相悖的。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报道了一则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消息。这在当时，是人们十分引以为豪的事，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此后，便形成了不向国内外借债的非常保守的财政政策，1969—1978年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②这就是著名的金融三原则：中国不接受外国贷款；中国不接受国外援助；中国既不接受合资企业，也不会在海外进行合资企业的投资。^③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直到1978年6月14日，中国外贸部长李强在接见记者时仍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国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积累建设资金。虽然不再拒绝、但也不准备依靠外资。^④

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却认为可以在具备偿还能力的前提下引进外资，李先念在1978年7月13日会见访问中国的日本三井物产总裁池田芳藏时表示：在“文革”时期，接受外国资金的政策会被“四人帮”攻击为“卖国”，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即将迎来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很需要外国、包括日本的资金，但如果利率太高就不好办了。中国只有在具备了偿还能力时，才会接受外国的贷款。^⑤事实上，邓小平对怎么引进外资更有利、从哪里引进外资、引进何种类型的外资早有考虑。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在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⑥

在中国政府转变外资政策的过程中，日本经济界（财界）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早在1978年7月，日本贸促会关西本部会长、对华友好人士木村一三向中国政府介绍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即ODA），利率较低，借贷时限长，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争取

① 《北京周报》，1977年7月12日。

②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③ 《北京周报》，1977年7月12日。

④ 《人民日报》，1978年6月14日。

⑤ 《朝日新闻》，1978年7月14日。

⑥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第277页。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大平正芳

使用,但借款须由中国政府提出。^①同年9月,中日经济协会会长、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访问中国时再次提出利用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的建议,^②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在访华时也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关于ODA的知识以及使用日元贷款的意义和作用。其后,日本经济界人士积极推动本国政府采取相关政策。1979年3月,日中经济协会常务理事诸口昭一向通产省贸易政策局局长宫本递交访华报告,建议“有必要采取金融合作措施,例如政府贷款”,以解决中国对进口设备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③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邓小平等中国政府领导人逐渐认为,争取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政府资金援助既有必要,也非常可行。邓小平在与日本访华人员的多次会谈之中,也流露出这种看法。例如1978年9月3日邓小平在接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藤山爱一郎、日中经济协会顾问冈崎嘉平太时,表示希望在资金、技术、企业管理等方面与日本方面加强合作。^④

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在25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宣布:尽管现在还没有考虑,但今后中国方面“愿意研究”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有关问题,^⑤明确发出了愿意与日方进行资金合作的信息。同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说:日本经团联会长土光先生告诉我,日元贷款应该在政府之间进行,民间无能为力的事可以在政府之间解决。佐佐木问:“日中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中国政府能接受日本政府的贷款吗?”邓小平当即明确而肯定的答道:“能。”^⑥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中方正在考虑接受日本政府提供的贷款,希望日方予以考虑、加以研究。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就日元贷款问题明确向日方提出愿望和要求。^⑦

① 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10—311页。

② 《日本经济新闻》,1978年9月29—31日。

③ 《日本经济新闻》,1979年3月4日。

④ 《朝日新闻》,1978年9月4日。

⑤ 《日本经济新闻》,1975年10月26日。

⑥ 《日本经济新闻》,1978年11月27日。

⑦ 武吉次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回顾》,《中国年鉴(1992)》,大修馆书店,1993年。

1979年9月1日,中国政府派遣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访问日本,正式提出日元贷款的申请。内容为八个建设项目,即石臼所港、兖州至石臼所之间铁路、龙滩水力发电站、北京至秦皇岛间铁路扩建、衡阳至广州间铁路扩建、秦皇岛港口扩建、五强溪发电站、水口水力发电站等,其资金总额为55.4亿美元。其中石臼所港、兖州至石臼所之间铁路、北京至秦皇岛之间铁路扩建、秦皇岛港口扩建均与向日本出口煤炭、石油有关。谷牧副总理对此解释道:“此次申请的合作对日本来说也会带来长期的巨大利益。也就是说,能源问题是今后国际政治经济的重大问题,另外对产油国来说,与民族主义、民族独立的动向相辅相成,石油成为一种武器的趋势难以否定。另一方面,石油到本世纪末是有限的,在其背景下,煤炭贸易成为中日之间的重要议题提上议事日程。”^①

大平首相会见了代表团,表示在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上,继续保持和发展民间交往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将尽力予以协助和支持。园田直外务大臣在与代表团会谈时透露,第一批日元贷款的规模为500亿日元,年底大平首相访华时可正式敲定。代表团还特地看望了前首相田中角荣,田中说二战后一些国家的经济振兴都利用了外资,在当代世界上借用外债是各国建设中通行的一种办法。代表团还会见了稻山嘉宽、冈崎嘉平太、荻原定司、木村一三等企业界人士,并到名古屋、京都、大阪参观了工厂、港口和城市设施。在参观访问过程中,日方有人示意希望中方对日本政府向中国贷款公开表示一下谢意。其后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谷牧强调说:“中日两国从各方面发展友好合作,是两国的共同需要,对两国人民都很有利。我们会用好贷款,高质量完成使用贷款的项目。”谷牧在会上还宣布:“中国建设所需资金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也要引进外资,只要条件适当,我们将接受所有友好国家的贷款,也准备参加联合国金融组织,接受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贷款。”^②

实际上,当时中国政府“接受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工作方针

^① 外务省行政文书:《对华资金合作政府调查团(访问谷牧副总理)》,1979年10月9日,转引自林载恒:《第一次对华日元贷款决定的分析——从70年代中日经济关系的视角》,载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编:《本乡法政纪要》,No.14.2005。

^② 谷牧:《谷牧回忆录》,第311—312页。

是：一、务必力争谈成，但不要急于求成，要有充分的耐心；二、不卑不亢，尽管贷款的条件优惠，但有借有还，不是我单方有求于人，对方也不是施主，而是对双方都有利，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双方都需要；三、在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下，具体事情上可以适当互让。”^①

二、日本政府决定对华日元贷款

1978年2月，中日之间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规定双方基于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及贸易协定的精神，在平等互惠、互通有无、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缔结协定。具体内容在1978年到1985年之间，中国向日本出口约100亿美元的石油、煤炭，日本向中国出口约100亿美元的机械、成套设备等。^② 尽管该协定规定决算方式原则上采取延期付款，但因中国仍然坚持不接受援助、借款、投资等金融三原则，日本担心中国方面的支付能力。同年9月，通产大臣河本敏夫访华时提出建议，以6.25%的年息向中国提供进出口银行贷款，用于开发石油、煤炭。中国方面为避免汇率风险希望以美元结算，但大藏省坚持“政府系统银行不能以外国货币结算”，交涉进入僵局。这样一来，通过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提供日元贷款便成为日本政府的一个选择方案，因为该贷款年利为3%左右，偿还时期30年，即使以日元结算也是一种较为优惠的贷款。

在日本政府内部，围绕是否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外务省与通产省存在不同意见。通产省态度较为积极，例如当时通产省通商政策局局长矢野俊比古说：“若考虑到当今的中日关系或日本的国际环境，（中日贸易的扩展）不仅可以确保资源能源的供给安全，还可以做到资源市场多元化”，甚至还能“确保一定程度的成套设备出口市场”。^③ 但外务省考虑到与欧美、东盟、苏联

①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

②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20—221页。

③ 矢野俊比古：《日中长期贸易协议的意义与问题》，《世界经济评论》，1978年5月号。

的关系，态度较为消极。当时外务省的内部主流意见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应加大改善日苏关系的力度，同时将对外经济合作的重点放在东南亚各国。当时的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强调，“中日关系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与其他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为前提”，对中日经济合作过度亲密化表示担忧。^①外务大臣园田直在1978年10月召开的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说：“日本不会偏向中国或苏联，不会协助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华关系的重点不是经济，而是文化交流。”表示要慎重考虑对华日元贷款。^②

欧美国家对于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抱有疑虑，认为日本有可能利用日元贷款独占中国的潜在市场。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对东南亚的ODA大多采取限制方式（即提供贷款的建设项目所需物资由日本提供），结果使日本企业大量进入该地区。由于欧美国家也注重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潜在市场，要求日本在向中国提供贷款时采取也可以购买其他国家产品的非限制方式。例如美国在1979年10月17日及18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日援助政策规划会议上表示；“如果日本不采取非限制性方式，将导致加剧美日之间经济贸易摩擦。”^③

作为日本主要援助对象的东南亚国家也担心日本突然提供巨额对华ODA会减少原应提供给东盟国家的ODA，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利用日本的ODA加速现代化，将成为东南亚各国市场的有力竞争对手。对此，日本政府代表在1979年11月26日举行的日本与东盟经济阁僚会议上强调，将继续保持重视东盟ODA的方针。1979年度对华日元贷款设定在500亿日元，与印度尼西亚的贷款金额一样，正是出自这个因素。

苏联对日本实施对华ODA表示强烈的担忧。中苏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恶化，中国提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入“反霸权条款”，意味着中日双方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中承认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立场。苏联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担心中国利用日本的资金与技术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例如铁路、港湾、机场的修建不仅有利于平时的经济建设，在战时也能

① 中江要介、河合良一：《日中经济交流的新时代》，《经济学人》，1978年10月3日，第83页。

② 《朝日新闻》，1978年10月13日。

③ 《日本经济新闻》，1979年10月25日。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大平正芳

发挥输送人员与物资的功能。^①

然而，中日经济合作出现问题以及美国加快对华经济合作步伐使日本政府的态度迅速发生变化。1979年2月26日，担当成套设备进口的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突然通知日本的大型商社，暂时停止实施双边签订的成套设备合同。其对象包括1978年12月16日以后签订的合同，其中有上海宝山钢铁厂2200亿日元的相关设备、石油化工、水泥等各种成套设备，总额超过4200亿日元、20亿美元。中国方面对此解释道：“是因支付准备不足导致的纯粹经济原因”，“但也不能否认与日本非合作态度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②日本政府却认为是中国政府修改现代化路线以及中越冲突等政治原因，大藏省仍然坚持原有方针，例如大藏大臣金子一平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虽然支持中日贸易的决算资金问题，但不能以美元结算方式，另外也不能无视国际协定，对华提供低息贷款。”^③

日本经济界对政府的消极态度提出批判。1979年2月，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渡边弥荣司访华，随即将中国政府的意思传达给日本政府，即“停止执行合同是支付问题带来的纯技术事件，中国没有改变现代化计划，中日双方应尽快解决资金问题”。得知这一消息的中日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也严厉批评政府道：“看起来停止执行合同是金融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仔细想来是首相应加以判断的问题。不应听其他国家批评日本利息较低的意见，应有日本自己的判断。”^④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也对日本有所触动。因农产品出口的急剧增长，1978年中美贸易额达到11亿美元，是前一年的三倍。同时，各种经济交流也频繁进行。同年6月，福特汽车董事长访问中国，与邓小平会谈技术合作问题。7月，美国技术代表团访问中国，协商原子能、水力发电的合作问题。同年底，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其后美国大型矿业公司与中国达成投资总额8亿美元以开发铜矿及精炼的协定，美国的金融机构也陆续与中国的

① 关山健：《中日经济关系发生如此变化——对华日元贷款30年的轨迹》，高文研，2008年，第52页。

② 《日本经济新闻》，1979年3月1日。

③ 《朝日新闻》，1979年3月3日。

④ 《日本经济新闻》，1979年3月15日。

银行建立交易关系。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并与中国达成首脑互访的协议，约定美国总统卡特将在1980年1月访华，并表示“今后五年后计划向中国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强化对华经济合作。^①受其影响，对华经济合作方面不能落后于美国，首相应在卡特访华之前访问中国，以推动中日经济合作的密切化的意识得以产生，日本政府内部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呼声增强。

中国提出日元贷款的申请后，以外务省为中心开始具体的准备工作。在9月底政府调查团访华之前，起草了《中日经济关系长期展望报告书》，强调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需要向中国出口机械、成套设备，同时从中国进口石油、煤炭、金属等资源能源，因而从整体上看，中日贸易关系是一种互补性关系。同时考虑到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外务省主张采取日元贷款“非限制方式”，因为1978年1月日美会谈时曾约定为“减少顺差”而采取“非限制方式”。实际上，派遣政府调查团以来，美国通过各种方式要求日本采取非限制方式，否则考虑到美国企业界和议会的态度，将反对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

但通产省极力反对，其态度与对华出口成套设备有关，因为采取“限制方式”不仅可以满足企业界的要求，而且也关系到将来对华贸易的方向性问题。日本贸易会、日本机械出口协会、日本设备协会等经济界团体纷纷发表反对“非限制方式”的意见，并得到大藏省的支持。这些团体和大藏省认为从日本进口材料、设备和技术建设贷款项目，能够强化双边经济合作的意义。^②另外在贷款总额问题上，通产省主张六年援助总额为15亿美元，外务省主张不显示总额、每年召开会议决定第二年数额的“单年度主义”。这种主张除财政方面的原因外，也考虑到东南亚各国的反应，因为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东南亚时提出的援助总额仅为10亿美元。

执政的自民党内部也存在不同主张。尽管自民党多数议员支持对华日元贷款，政务调查会长河本敏夫在1979年9月4日对访日的中国副总理谷牧表示，自民党努力实现对华日元贷款，^③但也有不少议员主张采取慎重态度。

① 《日本经济新闻》，1979年8月28日。

② 《朝日新闻》，1979年11月11日。

③ 《人民日报》，1979年9月7日。